

第二章 杜威思想的背景

杜威認為哲學家有其時代任務，哲學應幫助人們清除不當的偏見與無用之陋習，但這不是說人們必須卸下所有的歷史包袱，精良的文化不但可作為人們思考的資源，同時也具有借古知今的功效。杜威本人深受美國環境影響，他的哲學除了以傳統歐洲的思想為基礎，更彰顯出新大陸人民慣有的思維模式，本章將介紹當可見出此位思想新舊交融的哲學家之成長背景。第一節介紹杜威的生涯發展，第二節則以杜威成長之時代背景為探究焦點，重在釐清影響杜威思想的環境文化因素；第三節介紹杜威的思想沿革，發掘杜威哲學之接續演變歷程。

第一節 杜威的生平

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在《西洋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對杜威有著如下的描述：「杜威是位品行高潔無比的人，他的觀點是自由開放的，在待人方面寬宏親切，工作則能孜孜不倦」(Russell,1972:819)，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也認為杜威一方面繼承了清教徒般的道德操守，同時又能切合實用，接受民主與科學的養分(引自 P. A. Lawler,1992:49)。縱使許多學對杜威的評價極高，但並非溢美之詞，縱覽杜威的一生，可發現這位著名的思想家私下待人謙和有禮，晚年雖然地位尊崇、蜚聲海外，但他依然秉持一貫的信念為社會事務奔走，可謂知之真切卻又能篤實踐履。

另一方面，他的學術研究工作則持續到晚年依然筆耕不輟。對他而言，學問如同浩瀚無止的宇宙，知識如同取之不竭的活水，每一門領域都是有趣且有用的；另一方面，杜威仍抱持著對當代社會與全體人類幸福生活的終極關懷，他認為理論不應只是紙上談兵的浮誇言論，應該能夠在生活中落實。以下將杜威的生命經驗分成三個階段，每一時期的成長經歷都對他往後的思想發展遺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從中也可窺見他是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增進智慧、貢獻一己之力服務人群。

壹、自然質樸的童年時期

杜威出生於 1859 年，美國佛蒙特州(Vermont) 白靈頓鎮(Burlington)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裡，其先祖為英格蘭移民，後遷徙至美國麻塞諸塞州(Massachusetts)。杜威家庭三代務農，直至其父艾契巴德 杜威(Archibald Dewey)遷徙至該鎮後以經營雜貨店維生。杜威在家中排行第三，大哥早夭，杜威從小便和二哥與小弟共同學習成長。杜威之父雖非通達學理的智識份子，但卻常利用閒暇時刻廣博閱覽許多文學家如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1564-1616)、愛默森(R. W. Emerson,1803-1882)等人的著作，並自娛般地背誦出其中的段落(T. C. Dalton, 2001:24)；與人們交遊時他作擁有極佳的說話技巧，並為自家商品製作廣告，這一切使他在當地獲得了不小的聲名。除此之外，記憶力極佳，常向杜威兄弟們娓娓道來其童年趣事及從軍軼聞。

母親露西娜 雷芝(Lucina Rich Dewey)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中，他們不但權勢顯赫，同時家中成員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因此相當重視其後代子女的教養。受到家族風氣的薰陶，杜威兄弟二人從小便在母親的嚴厲督導下展開刻苦的求學生活，杜威母親希冀子女們皆能繼續從事高深學問的研究。此外，她還是一位虔誠的喀爾文教派信徒(Calvinism)，教導杜威恪守信徒規律，過有德者的生活，並參與各種宗教活動，如：禱告儀式、背誦教條等，此種嚴格的宗教教育方式，雖然使杜威行為舉止皆合於宗教禮節，卻也常令他心中產生疑惑。由於杜威幼時便在其母的規定下開始學習宗教禮節，對他而言宗教若缺乏信仰者的虔敬之心，也只是淪為日常生活的例行公式(Dalton,2001:26)。對杜威而言，他對宗教壓制人類原始傾向以嚴守理性規範，頗不能認同，在他心中，時常感覺到紛亂的騷動，而一些情感卻無從得到妥善抒發，於是他寧可返回內心探求自身所信奉的價值，並透過適當的表達方式來抒發各種情感，宗教透過克制私欲以獲得救贖的方式，只讓其幼年心靈蒙上了一層心靈陰影。杜威幼時對於信仰的質疑也連帶影響其日後的研究工作，並持續對分裂人心的教條主義及二元哲學做出深刻的批評。

雖然，杜威的雙親在個性上及對子女的教養態度皆展現出些許的差異，但他們仍都希望杜威能在一個安穩舒適的環境中成長。大體而言，杜威的家庭生活是

美滿且幸福的，同時物質也從來不虞匱乏。杜威兄弟從小即酷愛唸書，一方面父母常為其添置各類書籍以鼓勵其探索知識，另一方面他們會利用課餘時間從事各種職業勞動，如派送地方報紙、計算木材等，一來可賺取購買書籍的費用，同時還可幫忙負擔家計。因此，杜威從小即體會到勞動與社會分工合作的重要意義。

白靈頓鎮不似典型佛蒙特州的其他村落，它擁有較多的新大陸移民，如愛爾蘭裔、法裔加拿大人，因此該鎮的文化氛圍較為多元與開放，雖然如此，該鎮的人口組成仍然以英格蘭移民為主，故傳統的禮儀規範仍主導了當地居民們的生活，但多元的異國文化也可為當地居民所接納。杜威從小便在此環境中與其他不同家庭背景的小孩共同玩耍交遊，受到不同文化的刺激與薰陶，他的心胸也較為廣博與開放。在小學階段，杜威兄弟共同進入該鎮的一所公立小學就讀，在當地無分貧富、新舊移民的家庭多送其子女入該校，但學校的課程大抵仍沿襲英國傳統，以教導古文、拼字等科目為主。學校教材相當枯燥無趣，唯有課餘討論或休閒時間可以吸引杜威的興趣，他與同伴將大部份的注意力投注在白靈頓鎮優美的湖光山色中，在大自然的田園風光中尋找樂趣。他們熱愛山溪野釣、露營等戶外活動，同時也樂於親近大自然，享受身體活動所獲得的無窮趣味。風光明媚的自然環境、優美的湖泊、田園與山巒點綴了杜威曼妙的童年光景，這種對於自然景色的喜愛也持續到其晚期生涯(Dykhuisen, 1973:5)。樂趣在書本中得來不易，但在自然中俯拾皆是，父母的殷切期盼與手足情誼、與社區居民的緊密連結皆成為影響杜威往後人格發展與性向的重要因素，那快樂逍遙、自由自在的童年時光讓杜威更加珍視日常生活的幸福軌跡，而強調理論應在實際生活中落實的價值亦可在其幼時的生活中方可見出蹤跡。

貳、新舊思想交迭激盪的求學階段

1875年，十六歲的杜威從當地公立中學畢業，旋即進入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就讀。該所大學創立在1791年，在新英格蘭地區算是一所歷史悠久且富聲譽的學校。在此時期，杜威修習四年的大學課程¹，其中尤以

¹ 佛蒙特大學在此之際間，仍只是一所規模不大的學校，共只有工程(engineering)和農業(agricultural)兩所學院，前兩年的課程教授希臘、拉丁等古文學習，另外還有歷史、分析地質學與微積分等科；第三年開始則加入了自然科學，如動物學、地球科學等；第四年是專為學生介紹更為高深專精的知識，如哲學、心理學等科目(J. M. Dewey, 1951:10)。

大學第四年所接受的哲學課程影響杜威最深。幼時接觸的宗教信仰，使得杜威從小便對神與人、有限與無限等二元劃分感到困擾，於是當課堂上接觸到賀胥黎的生理元素 (Elements of Physiology)一文時，他認為其中描寫到人類皆具有同一性質的段落，特別地吸引他，並引導他建構出一幅理想的世界圖景：所有的存在物皆具有共同的特性(Dykhuisen,1973:17)，也就是其本身皆為一個互相關連、緊密結合的有機整體，而人類亦在此之林；另一方面，哲學課程的諸多教授也帶給杜威不同的思想激盪與刺激，其中尤以托瑞教授(H. A. Torrey)的影響最深，在他的教導下，開展了杜威的哲學視野，並促使他決定以哲學為一生的職志。

托瑞為傳統蘇格蘭派(Scotch Schools)的哲學家²，他相信人類的直觀能力，並堅守道德宗教、藝術領域中具有的精神價值，認為它們不是運用科學、數理分析等能力即可發掘出來的。雖然托瑞具有鮮明的哲學立場，但他依然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杜威便是在其教導下，潛心於哲學問題的探究。另外，大學圖書館珍藏的許多期刊雜誌，如 十九世紀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半月刊 (Fortnightly Reviews)等刊載了許多專門引薦西方思想的論文，從對傳統思潮的介紹到新興理論的評論無所不包，如唯物論(materialism)、不可知論(agnosticism)、新心理學(New Psychology)、進化論等。杜威在大學時期，便沈浸在圖書館包羅萬象的知識之海裡，在不同思想的交迭激盪下，他廣博吸取各種理論的精華，這些都奠定了使他往後哲學研究的深厚基礎。

杜威從大學畢業後，透過親友的介紹到賓州(Pennsylvania)的石油城(Oil City)擔任教職。雖然他的教學經驗略顯不足，但仍能憑藉其友善親愛的處事態度與學生相處融洽。同時，在工作之餘，他仍不忘從事哲學書籍的研讀，並與托瑞來往密切。此一時期，杜威在美國唯心論者哈里斯(W. T. Harris,1832-1909)所創辦的思辨哲學期刊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1882)中發表了數篇文章。當時的杜威對其日後研究的方向與焦點尚屬模糊未明，但從論文的寫作過程裡，卻已經感受到存在於個人思想觀念與實際經驗之間的矛盾處，他發覺用形式邏輯的

² 直觀論者(Intuitionism)相信人類心靈具有某種「先天觀念」(innate ideas)和「基本信仰」(primary beliefs)及認知的基礎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les)，這也是人們在思考何謂真、美、善等問題的前提要件，他們相信人類心靈本身並無能力抵抗這些觀念的產生(J.M. Dewey,1951)。直觀論在某種基礎上，的確賦予了道德與宗信念等問題之合理基礎，以避免人們受到英國實證主義與經驗論者的影響。

論證方式雖然可解決許多問題，但仍必須對抗許多源自於個人內心或具體經驗中與邏輯相違背的事實。

兩年後杜威辭職教師工作，並於 1882 年進入約翰霍 霍布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繼續其研究所的課程。約翰 霍布金斯大學創校於 1876 年，距離杜威入學不過幾年時光，但它已能提供完善的制度鼓勵該校學生從事研究工作，同時，校長吉爾曼(D. C. Gilman)相當注重新觀念與原創思想的提出，它的設立正如同杜威所形容的：「這所大學的創設顯示出美國的高等教育邁入了一個嶄新紀元」(Dewey, 1930/1973:6)，這也是杜威選擇該校就讀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該所學校的哲學研究所在當時因成立時間未久、研究風氣仍不興盛，連帶使得許多課程因缺乏人力、物力而無法順利開設，其中也包含了杜威主修的社會哲學等課程。但研究所內仍擁有一些嚴謹治學、熱心教學的教授，鼓勵學生從事研究，並給予生活上的照料，杜威便在莫里斯(G. S. Morris, 1840-1889)教授的引導下，開始研讀黑格爾的哲學，莫里斯原來是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教授，在杜威求學期間於約翰 霍布金斯大學主持哲學研究所的課程與學術演講。他是一位德國觀念論者，與莫里斯教授的往來，使杜威從傳統保守思想派中解放，他看到人類整體發展的可能；同時在往後的研究路途上，莫里斯也常給予杜威許多援助與諮詢。除此之外，杜威也積極向外所尋求資源，以補充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相關知能；同時，他並在 思辨哲學 上發表了第一篇哲學論文 唯物論的形上學假定 (The Metaphysical Assumption of Materialism)，至此之後便一直維持著規律而固定的創作量。

與莫里斯教授的交遊使杜威開始接觸黑格爾哲學，黑格爾調和主觀與客觀、精神與物質、身與心二分的作法，使他獲得解決滋擾內心已久的良藥，哲學最終成為他心靈的救贖。此一時期的杜威如同一塊不斷吸取智慧的海綿，持續接收各種思想之精華，從美國傳統的保守宗教思維、瀰漫當前社會的科學新新潮，以至歐陸思想，無論是從大環境的主流思潮到求學階段時環境中所遭逢的人、事、物，對杜威的哲學思想的形成皆扮演了極大的促動因素。可以發覺，在這種新舊思想交迭激盪的重要時期，除了杜威本人具有開放的心靈空間外，虛心求知的態度更是奠定杜威日後產出質量俱豐之學術佳作的重要關鍵。

參、理論與實務兼重的研究生涯

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杜威獲得推荐至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授哲學課程。剛開始從事研究的階段，杜威仍信奉黑格爾學說，但之後黑格爾哲學卻與他的心目中理想的哲學探究方法出現了落差，一方面他受到當代科學實驗精神的影響，一方面則欽佩於當代美國實用主義學者詹姆士的學說，他接受了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以客觀生物研究為基礎的心理學說，並從中找到從事哲學探究與解釋人類心靈功能的方法。

值此之際，杜威與查普曼女士(Alice Chipman)結婚，查普曼女士是一位機智、慷慨且熱心公益的女性，她雖然擁有虔誠的宗教信仰，但對教會的信條卻始終保持著懷疑的態度(J. M. Dewey, 1951:21)，不盲從權威；除此之外，她對教育事業極富熱忱，尤其對幼小孩童的學習方式特別感興趣(Dykhuisen,1973:66)，這連帶也使杜威投注更多的心力在社會實踐活動中，並使杜威更為關注人類教育事業的發展。大抵而言，杜威夫婦兩人的婚姻生活是安和穩健的，查普曼女士相當理解杜威為人處事原則，並始終支持他的事業，兩人除了育有多位子女外，還利用遊歷各國的機會收養貧苦孩童；他們的經濟條件並不特別富裕，但仍慷慨解囊、幫助社會弱勢與熱心公益，同時在閒暇之餘，夫妻兩人更時常相偕參與許多聚會與活動。查普曼女士一向注重平等、自由等議題，她在杜威訪華之時，還曾參與南京的婦女解放運動，此種精神正與杜威不謀而合、兩人不管於公於私皆能相濡以沫、共同成長。

1881 之後，杜威曾短暫轉往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任教，後又返回密西根大學，並先後與塔虎脫(J. M. Tufts)、米德(G. H. Mead,1863-1931)結識，前者與杜威出版了《倫理學》(Ethics)一書，後者的社會心理學則帶給了杜威許多啟發，同時米德夫婦並與杜威夫婦往來密切。此時，杜威的研究興趣仍集中在倫理學與心理學領域，他試圖為傳統哲學部門的倫理學找到實際生活的基礎，而心理學研究則提供杜威許多客觀性的資料，他發覺心理學在解釋人類學習的心靈功能是相當具有說服力的。

之後，杜威轉往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任教，便積極籌措教育事

務、成立了實驗學校(The Laboratory School)，用以觀察教育活動中孩童實際的學習過程。由於杜威堅信人類發展的歷程就是一種繼續不斷的教育事業 (Dewey,1916/1980a)，唯有從實際生活中將舊經驗改造與重組，才可使人類生活朝向完滿，因此教育對杜威來說，就是生活，也是人類最重要的事業。杜威除了撰寫多篇教育論文外，還持續關心科學方法在教育問題上應用，他秉持科學的實驗精神開創出 芝加哥學圈 (Chicago School)。在芝加哥大學的這段時期，是杜威的教育實踐事業最活躍的階段，他除了構思一種新的教育理論，更躬身實踐、將其愛心與耐心灌溉於教育這片田畝之中，雖然實驗學校最後因經費問題而結束營運，但其卻直接而深刻地影響到美國往後的教育發展。在大學校園之外，杜威與當地的社會團體皆有所接觸，如他參與了一個社會福利團體 - 「霍爾之家」 (Hull House)，他在那裡結識了各種社會階層的人士，他們組成了一個友善且互助的團體，從事問題的討論。杜威在那兒充分感受到一種充滿人道且道德的生活氛圍，開放自由的風氣與不計得失熱心社會事務的態度都顯示出它並非只是個制度化的營利組織(J. M.Dewey,1951:29)；此外為改革傳統學校制度而奔走的教育工作者，如帕克(F. W. Parker,1836-1920)也使杜威見識到社會實踐團體的強大影響。

1904 年後，在杜威開啟了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Columbia)階段的研究教學生涯。當時許多學者，如接受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B.C. 384-322)自然主義形上學假定的伍德布立茲(J. E. Woodbridge,1867-1940)創立了哲學、心理學與科學方法的雜誌，促使杜威重新思考一個作為調和形上學與實際經驗的哲學基礎(郭小平，1994)。同時，他還走訪了許多國家，如中國、日本、土耳其等，並發表一系列的演講，返國後多集結成冊，並將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期間的研究成果付梓成書，如《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思維術》(How we think,1933)等。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時，杜威創作產量豐富，除了建構出以經驗為基礎的形上學思考外，還將其涉獵的領域擴展至藝術領域。

與巴恩斯(A. C. Barnes,1872-1951)的結識促成了他日後探討美學問題，當時的巴恩斯還是一位科學家及學生(J. M. Dewey, 1951:37)，他們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中相遇，此後兩人便建立起緊密的友誼關係、交往甚密。巴恩斯本人以蒐集現代繪畫聞名，他希冀這些繪畫能作為教育目的之用，並推動藝術教育。由於懷抱著

對藝術的熱情，巴恩斯不但創立了基金會(The Barnes Foundation)，同時還與杜威共同討論許多藝術問題，杜威在寫作《藝術即經驗》一書時，他對杜威書中的章節與內容提供了不少建議。因此，杜威在該書出版時，更特別將此書獻給巴恩斯，這本書可作為他們兩人友誼的見證。

另一方面，杜威在這段期間內逐漸出其政治哲學的輪廓，他除了從新審視許多具有爭議性的概念與議題，如：「自然權力」(natural right)、「效益論」(utilitarianism)，也積極參加公領域議題的討論。他對當時政府的言行做出許多犀利的評論，並熱衷於濟弱扶傾、打擊不義。此外，他關心許多時下社會活動，如：爭取婦女權益、參與競選活動的討論，由於他為人正直，且堅守政治上自由主義的立場，因此對於侵害個人權益與自由的行為深惡痛絕，他常以個人的名義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活動的蹤影遍及世界各地，包括日本、中國、蘇聯等，日本當時社會改革運動正烈，中國則適逢五四學生運動，兩地不約而同地籠罩在一股民主、改革的氛圍中，杜威除了透過這些國家的活動對思想進行了一次重新反省，且也親眼見證到來自於政府之外的民間力量，其中中國知識份子發動號召的社會改革特別得到杜威的關注，胡適等人推動的「新文化運動」使杜威更加確信教育影響社會風氣的重大力量，以及理論結合實務的重要性，他在返國後，並將訪問多國的文章集結成冊。

誠如羅素所描述的，杜威在工作上是位孜孜不倦的學者，他於哥倫比亞大學退休後，仍持續創作、老而彌篤，好學深思的精神令人感佩。他的一生，雖然不似許多思想家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也缺少波瀾壯闊之激情，但在看似平順、單調的學術生涯裡，他卻一再挑戰當前的價值觀，為能促成理想實現及關乎廣大人類福祉的活動奔走。他認為唯有思考，才能促進全體人類之成長與社會進步，而民主更是他認為最佳的社會價值。私底下的他除了喜愛求知、廣博涉獵許多領域的學問之外，還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長者，蘇格拉底般的反省精神正是杜威一生所奉行的，也就是透過思考以促成德與智的增長。杜威雖然身為一位知名學者，卻不咄咄逼人、目空一切，而是在實際生活的試煉中砥礪待人處事的原則，對他而言理論研究對他而言的最終目的仍在於廣大社會之改造，以改善現代文明生活中弊病叢生的問題及人類心靈疏離乖張的情形。

第二節 杜威思想的時代背景

杜威(Dewey, 1927/1984c)在《哲學與文明》(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一文裡曾描寫當代文明社會常面臨的弔詭，即在舊與新價值交替並陳、社會急遽變遷的時代裡，人們心中可能產生的惶恐：一邊仍眷戀傳統，一邊則希冀衝出藩籬以創造新事物的矛盾。透過經驗的成長，人類的文明體制、傳統如同物質世界般皆成為自然的一部份，這個意思即是透過經驗得以深入到自然之中，但由於人類的不同經驗，使得參與的方式也是多樣的。杜威所身處的美國，是個獨立不久的國家。在立國之初，它依舊沿用許多殖民時代留下的傳統，歐洲文化在國家發展的初期仍具有不可估計的價值（許孟瀛譯，1948：19），如文學、藝術與哲學等領域，它們多半棲身於當時的大學院校中默默發展著。每一個社會皆有其根深蒂固的風俗習慣、習焉不察的行為傾向，美國亦然，唯有等到新與舊的內在價值發生出衝突時，人們才會加以注意，並思考協調新舊之方，許多思想於是應運而生，在人類活動的連續模式中找尋新與舊的銜接之道。

杜威理論發展的背景，適逢美國獨立建國的一百年後，當時它早已挹注了許多古殖民國的文化流泉，使整體社會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但一方面社會中卻又暗暗醞釀著變革的動力、驅使這個時代中的許多價值必須重新檢視以求改變。以下分從美國社會的民主化與改革運動及工業化都市中所面臨的危機談起，廓清杜威理論發展的時代中，產生的正向與反動能量，而這些能量皆扮演著催生美國新時代理論的推手。

壹、民主化與社會改革運動

美國脫離英國獨立，顯示出人民脫離傳統威權體制的不當壓迫，並勇於追尋個人生命、自由與幸福等權利。³這是劃時代的歷史新頁，同時也標誌著近代民主的重要里程碑（林立樹，2001：65）。美國原為英屬殖民地，但由於在地理大發現後的十五、十六世紀所興起的一股海外移民風潮，使歐洲各國的居民陸續遷

³ 美國「獨立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之內文，主要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撰寫，其受洛克(J. Locke, 1632-1704)的平等觀念影響至鉅，但傑佛遜認為平等不是指天生的體格、能力、性格等，而是指權利上的平等，權利則由法律所規範，故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獨立宣言後來成為近代尋求獨立與民主建國的重要文獻。

徙至此。因此，除了英格蘭人外，這片土地尚有法裔、西班牙裔、荷蘭裔等多個民族，形成了多元文化共處的情景，同時美洲大陸上的原住民，即印地安人，也為該片土地的重要主人。英國最後雖取得了北美洲的統轄權，卻實施了許多不當的高壓政策，干擾原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再加上許多零星衝突事件導致民眾累積了許多不滿情緒，終於演變成美國獨立戰爭。新政府成立後，如何以適當的措施凝聚全國各地的向心力，並使各族相安無事、齊心一致建設國家，實為當務之急。雖然各地居民的背景多元，各自擁有不同的文化習性，但基於「獨立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治者來自被治者同意」的理念之下，美國仍制訂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替現代民主國家樹立了優良的典範(林立樹，2001)。

由於擺脫了強權的干預，依法治國保障了美國境內全體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美國自此邁向民主化的生活，除了各地城市重建的工作，中央政府更積極整頓內政、發展經濟與外交、推動全民普及教育、統一語言文字、推廣科學與藝術，一時社會氣象萬千，國力蒸蒸日上；社會上也瀰漫一股改革風氣，各地致力爭取廢除各種不平等的政策。當時各種社會運動熾焰高漲，各地人民以具體行動實際展現出對自由的熱愛。美國社會由多個民族組成，獨立後地方意識又紛紛抬頭，不同利益團體摩擦頻仍、衝突四起。但在此過程中，卻順勢帶起了一股改造運動，消除舊有英國社會的不當制度與陋習，賦予新大陸上的人民追求嶄新生活價值的勇氣。杜威認為民主不僅是一種政府體制，也是一種人民生活的最佳方式，民主勇氣透過不同群體之間的適當溝通與交流，達成價值的共享(Dewey,1916:100)，而在此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陌生情境與挑戰，正是人類與環境相互適應時的課題。除此之外，則有黑奴問題使美國人得以重新審視民主的真諦；戰後一連串的重建繼之展開。其中，1860年興起的西部拓荒運動則告訴了人們，有許多事物是己身所不能控制的，當人類遭逢不順遂抑或危難關頭等挑戰時，該如調整生活節奏及善用所學、披荊斬棘，皆考驗了人們的智慧。

貳、工業化都市的興起與潛藏的資本主義危機

美國南北內戰結束後，新技術的發明與礦產大量開採等因素，工業迅速發

展，工廠規模不斷擴增，進而帶動了國家經濟的成長。這片土地上實蘊含著豐饒的資源，再加上人民勇於挑戰大自然的精神，鐵路的鋪設與政府關稅政策的開放更有如錦上添花，讓美國能從此波工業起飛的效應中獲得蓬勃的發展。美國人民多半胼手胝足、腳踏實地，而這種精神一時蔚為全國風尚，許多人致富之後，以其豐厚的資金取得更多的利潤；鄰近礦產或水路交通樞紐地帶的城市則發展為大型都會區，出現了較以往小型工業城鎮更為繁華的景象。都會中人們衣食無虞後，擁有更多能力追求高品質的享受，劇院、博物館此起彼落地興建，體育、藝術表演團體有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各種報章刊物則充塞坊間。財富的累積使美國人得以享有更高水準的生活。

另一方面近代科學自從牛頓(I.Newton,1642-1727)之後，開啟了一種新的典範，科學家們從經驗中觀察事物、提出假設並驗證歸納所得，發現了許多新的觀念與定律，也破除了許多傳統的迷思與想像；而由科學發展而研發出的新技術替人類帶來最為便捷的物質享受，機械不斷汰舊換新，節省了許多人力與物資的浪費。這種科學的革新歷經各代的發展依然方興未艾，到了十九世紀更成為了一種人民信仰的生活方式，認為將思維的結果付諸於經驗中檢證的科學方式，是最為直接且有用的作法。科學不僅帶給美國社會有形的物質享受，它所憑藉的方法則勾勒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和通往真理的捷徑。比起哲學思辨人們更願意服膺經由科學實驗所獲得的結果。雖然如此，工業化與科學的興起卻也衍生了不少問題：工業致富所造成的貧富懸殊；同時，富商壟斷資源與市場，工人處境堪慮，由於工業發達，人民瞬間致富也漸次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過著富裕生活的現代文明人，以金錢換取物質享受的同時，卻形成了爭取個人私利、貪婪粗野的生活習性，他們求取大量的物質滿足，卻罔顧生活的品質與心靈的富足安康；都市化的生活使人逐漸遠離了田園與自然風光。

參、杜威對美國社會之觀察

散文家梭羅(H. D. Thoreau,1817-1862)曾說：「奢侈與舒適的生活，妨礙了人類的進步，最明智的應是，外表雖然窮困，內心生活卻再富有不過」。便是在美國當時日漸浮濫的都市氛圍下，移居到郊外美麗的華爾登湖(Walden Lake)居住兩

年，暫時遠離了喧囂，大自然的日月星辰與蟲鳴鳥獸撫平了他騷動的心靈。科學進步雖帶給人類無窮的希望與快樂，但繼之而來卻產生了逃避困境、玩物喪志與價值失落的病態人，一方面人類過度倚賴科學工具甚至追求其外在效益的結果，將使自身淪為為科學技術的奴隸，喪失了本身的尊嚴與自主決定的可能。

杜威對此一危機有充分的體認，一方面他指出：在近代生活中，自然科學比以往流傳下來的許多學科，與人類生活有了更為緊密的連結；然而，科學與人們的直接關連性卻仍僅止於物質生活與技術的層面，這與傳統宗教形成人類心靈信仰的力量仍稍有差異。科學技術應用在工業上雖使近世紀的經濟產生大幅的成長，但無論藉由新科學技術或經濟力量而帶來的名聲與財富，則物化了人類，使許多人汲營於利益的追求與物質的享受，個人反倒成為受慾望所累的奴役。

對杜威而言，為了免於傳統威權的不當干預從而壓迫個性的發展，民主是多元社會底下以適應差異的最佳生活方式。新工業與科學知識的傳播與資本累積的財富，使越來越多的人們皆能站在相當程度的基礎上追求更佳物質享受。但民主所倡導的自由原則卻反倒成為個人極力爭取自身利益的保護傘，卻罔顧他者的權益及社會集體的福祉。因此，杜威認為民主的精神並非固定不變的，民主主義的意義必須跟隨時代的脈動而有所調整(Dewey,1938/1988b:300)。一個以民主主義立國的社會雖然以平等與自由為指導原則，但自由並非流於非放任，也就是自由必須在平等的原則之下加以限制，也就是自由領域必須給予明確的界限，訴諸適當的權威加以限制，而權威正代表著社會組織的穩定性，在社群庇護下的個人才得以自由發揮所長、追求幸福的生活。

另一方面，雖然科學的創新發明抑或是藝術的璀璨成果都標示著個人掙脫了傳統的壓制而造就了變異的和創新的因素。但個人的創新仍有賴穩定且有組織的集體社群加以支持。杜威觀察到當前的美國世界仍呈現出不穩定、不安全和不斷增加衝突的景象。而他認為在自由與權威之間建立一種緊密的連結是必須的，同時，新科學的發展也不可僅作為一種方法或一種技術，否則一般人仍只是將科學當成遙不可及的偶像或只關切其所帶來的外在價值。

無論是民主大羣底下成形的放任式自由，抑或是日漸功利化的社會傾向，杜

威所關懷的仍是如何在穩定與變遷、權威與自由、科學與宗教等價值中相互適應，以尋找一條平穩且能持續成長的道路，這是催生杜威美學思想形成的重要時代背景因素。如第一章所提及的，資本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與專業化之氣焰加速了藝術與生活孤立化的情形；十九世紀末的美國社會，雖逐漸擺脫了舊式價值之桎梏，但隨之而起的社會問如何避免社會再度成為強權宰制的工具乃是新的挑戰。無論如何，從杜威身處的時代背景觀之，可知美國本身發展並不僅僅沿著一個單純的路徑前行（許孟瀛譯，1948），而是不斷在新與舊之兩極來回穿梭著。這種情節或許說明了人們在面對新事物時所產生的矛盾心理，有時遲滯躊躇、固守傳統，有時則大膽向前、毫無所懼，並在不斷的創造活動中，發現新的價值。當然這過程中並不是都一帆風順，可以看到的是在民主、工業化社會底下，仍然存在著許多人性醜惡的一面。

雖然如此，大體上漸次成長的經濟促成許多不合宜制度的更張，而民主觀念也在紛至沓來的衝突與調解間獲得了新的意涵。杜威便是在此種價值多元、變遷迅速的環境氛圍下開始思考如何以美的價值充實人類經驗之內涵，但誠如研究美國思想史的學者寇漢所言：「環境趨勢與社會傳統或許可以解釋某一哲學為何廣為接受，卻不足以解釋它的成因」（Cohen, 1954:319），這是必須知所警惕的。

第三節 杜威思想的演變

直至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以皮爾斯(C. S. Peirce,1839-1914)、詹姆士為代表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興起，才開創出美國哲學思想之獨特路數，這一批實用主義哲學家拋開傳統英國或歐陸哲學的思維模式，找到適用於美國社會發展的理論觀點，可以說是他們在對自己民族文化進行重新的審視後，所獲得的一種全新視野。至此之後，許多思想家便致力開拓不同的思想新路。其中，杜威與實用主義關係密切，他也主張知識必須與實際行為規則相印證，他常被稱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究其原因，除了其璀璨的思想結晶替美國諸多領域開啟了研究的無限契機外，更為重要的是，從他的思想中往往可挖掘出鮮明的美國特色（郭小平，1994）。換言之，杜威的作品不但反映出美國特有的社會文化，也從歐洲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卓然挺立出自己的新芽。綜觀杜威的思想發展，可從從絕對論至實驗主義（Dewey,1930）這篇精簡敘述其自身思想發展的文章中略窺究竟，研究者發現他受到下列三種觀點影響甚深，這也鋪織成杜威思想演變的重要脈絡。

壹、黑格爾的唯心主義

從杜威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唯物論之形上學假定》開始，他的思想大致經過了幾個時期的演變，直到晚年的《經驗與自然》，杜威的哲學研究方法與根基才算大致底定。審視杜威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可發現他受美國當時代的各種哲學思潮影響甚深，有些人在解釋其思想的起源時，荒謬地將它化約為美國北方佬（特指杜威誕生的佛蒙特鎮）習俗的表現（朱建民譯，2000：14），聲稱他的哲學是奠基於強調獨立與進取的社會條件上，而完全忽略了其思想脈絡反映了美國當代哲學發展的淵源。⁴杜威早期的生活深受宗教的薰陶，他的母親教導他重視傳統的美德，在基礎教育階段時，更受到十八世紀傳入美國的蘇格蘭直觀主義的哲學的影響，直觀主義者強調人類心靈擁有先天觀念，

⁴大抵而言，十九世紀之前，美國哲學仍處於英國思想鮮麗大傘的庇蔭下，尚未開展出自己的路徑，直至十九世紀中葉若干代表人物組織學會、創辦刊物，將德國哲學引至美洲大陸上，為美國哲學注入了迥異於英國的歐陸哲學色彩。

此種說法儼然替宗教權威找到了合理的詮釋，故盛極一時，學校多教導當時青少年此種哲學思維(Cohen,1954:324)。幼時接受的嚴格宗教教育與哲學思想在杜威心中皆刻畫出難以磨滅的痕跡，甚至影響到其後哲學的發展，這與杜威在課外田園生活裡，那種愉悅舒坦、怡然自得感受恰成對比，兩者無法協調困惑杜威許久，直到研究所階段研讀黑格爾哲學後，才從中獲致解決疑惑的良藥。

一、黑格爾哲學思想之內涵

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恍如黑夜中的一盞探照燈，指引著杜威往後有關於個人心靈與社會發展的見解，杜威曾自述黑格爾哲學對他的影響：

黑格爾之主觀與客觀、精神與物質、神人之統一，不只為一智識公式，且成為思想上之大解放。黑格爾之處理人類文化、制度及藝術，亦採用思想上壁壘分明、彼此對立之相同解決方式，對我特別具有吸引力。(Dewey,1930/1973:7)

黑格爾的哲學綜合、承襲了歐洲當時的兩股趨勢，也就是啟蒙運動及其反動力量 - 浪漫主義運動(Taylor,1979:1)。黑格爾關心人類自由的發展、理性與感性的統一，雖然他終究以為人類精神上的自由圓滿乃是。但黑格爾認為生命中兼具有連續與不連續二者，唯有人類意識的不斷開展，才可調和二者產生的衝突。

黑格爾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中，發覺精神會經過不同階段的統一樣態，其中精神自由的最理想狀態則將體現在社群生活的和諧統一之中。他設定了一個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認為人類發展的歷史都是朝此目標邁進的連續過程，絕對精神當是無限的，人類的有限精神不過是它的體現之一、是它的外在擴延。由此可知，若絕對精神是存在著的，則各種對立、區分是必然要產生的，唯有經過分裂的樣態，人類才會意識到自身的危機與衝突，而此意識實可幫助人們體察到自身的有限性，以朝向絕對精神之發展邁進。

二、黑格爾哲學對杜威的影響

杜威乃是在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的教授莫里斯那兒汲取了黑格爾唯心主義學說的精華，黑格爾認為古時哲學對知識的探討皆設定了一個永存的終極形式，但

它認為形式乃是在人類意識活動的發展歷程中而創生的，也就是形式並非從外部強加進經驗之材之中或彼此毫無關連，事實上人類意識開展的歷程中，所逐步展現的由潛能到實現歷程。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的統一(unity)與連續(continuity)概念一方面使杜威得以逃離生活必須壓抑感性、撕裂人性的幼年回憶，使杜威理解到人類與其所認知的對象之間應是被包含在一個整體中；一方面黑格爾對人類文明，包含制度、藝術等的研究瓦解了壁壘分明的態勢，也吸引了杜威。杜威認為黑格爾哲學不但以此說明了人類心靈從潛能到實現的歷程是互相關連且具有動態性的，同時人類的心靈乃隨時處在變化之中，而持續開展出不同風貌的文明碩果。

除此之外，莫里斯與傳統的唯心論者相較，他所重視的是存在本身的意義，亦即個人心靈意識對存在所起的積極作用，這使杜威開始思考知識不應獨立於自身心靈意識之外，或成為康德所言的先驗律則(Dalton,2002:50)。雖然此後，杜威受到當代科學的影響，而認為哲學慣用的邏輯方法並不能客觀解釋人類心靈的本質及知識的內容，最後甚且捐棄了黑格爾主義，但杜威始終都與黑格爾懷有相同的熱望，即追尋人類心靈的自由與整體文化的進步，如同他自己所形容的：「黑格爾一直是我思想中的沈積物」(Dewey,1930/1985:8)，可見杜威並未完全揮離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人類與其心靈的和諧統一樣態一直是他所關注的議題，而黑格爾也在其思想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不可磨滅的重大影響。

貳、達爾文的演化論

一、達爾文演化論思想之內涵

1859年，杜威出生，達爾文《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一書正好也在這年出版，達爾文在此書中提出了物種演化論的觀點，這個觀點引導近代自然科學邁入一個新的里程，對思想界帶來的影響猶如巨石投湖掀起了陣陣波紋。自亞里斯多德開始，歐洲的思想即一直臆測「存在的大鏈」，也就是以最低至最高依階級而完整排列的生命形式(蔡伸章譯，1993：479)。亞里斯多德認為，世界乃是由一個永恆、終極且不變的實在所創造出來的，而現象界的各種物質(matter)為朝形式發展都遵循著一條道路，這是終極原因預先制訂好的變化過程；亞里斯多

德還將現象界的物質區分成不同的物種(species)，此後許多哲學家大抵都試圖建立一種完善的知識體系，用以解釋現象界的各種事物，並對逐漸分化的學科領域，如科學、道德、藝術或宗教等加以評定。傳統哲學試圖說明人類世界中的萬事萬物彷彿皆暗暗遵循著造物者預先譜寫的藍圖行進，例如：變化無常的氣候、週而復始的四季循環、農夫的春播秋收，雖然它們看似都在綿延不絕的時間線上各自發生著，其實皆不間斷地在完成某個目標 - 一個終極實在所設定的目標，所以一切生命形式都是將自己引向完美的型態，而牽引生命發展的最重要力量，則是理性，唯有理性是可靠的與神聖的。

首先，達爾文不作哲學上的矯飾，他只是把過去對自然界的一些假設用源自於科學觀察的豐富證據加以概括起來。在達爾文之前，史賓塞(H.Spencer,1820-1903)就已提出了自然中存在著殘酷的競爭秩序，達爾文則將它挑選出來作為理論基礎之一，同時廣泛蒐羅資料、勤於實驗，經由這種客觀的科學方法成功說服了當時代的人們，他憑藉著證據以確鑿的數據解釋物種演化過程只是生物對環境做出的調適作用，隨著物換星移產生了生理機能的改變，杜威說道：

《物種起源》的出版標誌著自然科學發展中的新階段，這一點已為非專業人士所熟知，把物種和起源這兩個詞連接在一起，體現出一個理智上的反叛，並引進了一個新的理智上的特徵。（轉引自高廣孚，1990：21）

杜威所形容的，正是達爾文學說對思想界產生的撼動，達爾文提出生物優勝劣敗的選擇機制，此一主張打破獲傳統哲學的基礎。傳統哲學總是假定有一個永恆且普遍的終極實在，雖然他們承認現象界的變化多端，但認為這都是為了達於完美而必然產生的短暫現象；與此相反的，達爾文認為自然界詭譎莫測，一切有機體的適應皆是基於應付變化情境的偶然，從而排除不利的淘汰局勢。因此，達爾文所關切的只是生物所存的經驗世界之事實，而他在探究生物生存的事實時，基本上是採取一種動態連續的視角來探究其不斷演化的歷程。

二、達爾文思想對杜威的影響

早在佛蒙特大學時期，杜威在哲學的課堂上研讀賀胥黎的書籍時，便即為關注人類有機體同一性質的發展。當代的科學心理學與達爾文學說使得哲學對終極實在所作的思辨性探討益顯徒勞：首先，它推翻了造物主巧妙安排的幻想，由於現象中存在著美善，但卻也存在著醜惡，若獨論人類完美價值，卻不論其他不利條件，這是片面而狹隘的；除此之外，哲學使用的邏輯演繹預先設定了終極原因，斷言唯有當個別事物皆與此可解釋的法則相符時，才是正確的，這無疑本末倒置。用以複製出所欲求的答案，這種作法是毫無意義的。從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飄離」(drifting)，據杜威自己形容(Dewey,1930/1973:8)是極為緩慢的歷程，但他終究接受了達爾文對生物形成的解釋及其所採用的科學方法。

在杜威的著作中，常可見達爾文學說的影響痕跡，杜威認為生物對其所居住的環境進行調適的觀點不但適用於自然科學領域，同時也可給予和人類研究有關的領域一種全新的視角：人與自然彼此密切相關，人類並不外於自然界(Dewey,1916:333)。故達爾文對自然進行的客觀研究，消解了哲學形上問題探討的必要性，使人們正視生活周遭與其經歷之事，且不再依賴於未可知的力量。達爾文以「變化」(change)與「適應」(adjustment)的觀點說明包含人類在內的生物皆是自然的一部份，為了生存，人們也必須時時跟隨變化中環境而改變樣貌，變化的確是存在確鑿的事實，而跟隨變化而變化乃是持續不斷的適應歷程。達爾文如同黑格爾用歷程來解釋存在的樣態，但他所使用的卻是更為有效的科學方法

由此可見，在科學昌明的時代底下應運而生的達爾文學說，顯示出理論乃應關切實際的包含人類在內的現象世界，如政治、教育等領域，杜威認為人們需要一種新的精神就是師法達爾文劃時代般的創舉，直接關注生命本身，推翻對神學與哲學權威的盲從。同時，達爾文當代科學所得的碩果，使杜威明瞭到人類如欲獲得關於世界的確實知識，則應當從自然的事物入手，才可排除各種獨斷的不當預設。科學能使思想的內容成為真實，也就是透過歸納和實驗方法，在外部世界中加以檢驗(Dewey,1916:346)，人們皆希冀與其所身處的世界建立起更親密的聯繫，那麼科學方法即是入世的敲門磚。

參、實用主義

達爾文學說與科學研究成果皆大大衝擊了當時代人們僵化的思考模式，凡此種種對杜威思想皆有立即且深遠的影響。杜威接受了達爾文學說之後，持續關注知識的探究方法與應用，當他進入芝加哥大學任教後，他工作的焦點更轉移到教育等實踐層面，如何將科學方法應用在社會領域則變成他往後研究的重要旨趣。杜威在 1894 的《倫理學研究》(The Study of Ethics)中曾宣稱他的觀點為工具主義的唯心論(*instrumental idealism*)(Hann, 1970:25)。至此，杜威不再以黑格爾客觀的唯心主義為主臬，他認為知識應具有實踐的功能、必須隨著環境變化而調整，知識應指向未來，透過思考對預設的可能結果加以檢驗，並從逐步試驗的歷程之中形成一種關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邏輯理論。

一、實用主義思想之內涵

杜威的觀點恰與美國當時的實用主義者之思維相合，他們皆將知識當作人類的生活指引、主張個人心靈在行動中方能彰顯價值，並與環境構造出一種全新和諧的整體。實用主義者的主張大多承襲自歐洲的傳統，如皮爾斯原為康德主義者，實用主義一詞係為他考察康德學說中的「實用的」(*pragmatisch*)一詞(Dewey,1984a:4)而得。身為一名優秀的科學家，他更新了康德的知識理論，開創出與康德建立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實踐理性法則相仿的知識論，他認為知識在經驗領域內也可具有概念上的普遍性，而這有賴人們在直接行動中實驗而得，而知識的意義也體現在對生活產生的影響。按照皮爾斯的看法，他的理論雖蘊含著與人類行為的某種關係，但是行為無疑只是媒介(Dewey,1984a:13)，重要的是人們能在行為中獲得意義、把握概念，並通過這種過程，發現存在物的普遍法則，這就是知識所具有的內在價值，體現在生活中、體現在人們的行為裡。

詹姆士繼承了皮爾斯的這種說法並加以擴大或應用，他是個具有深厚新英格蘭清教徒傳統的美國人(陳伯莊譯，2006：26)，他的哲學或可稱為心理學的哲學，他不製造一個終極理性方能解答的形上學問題，詹姆士認為人們的行動是經由心理有目的之選擇，故知識也必須在行動所引起的過程之中去尋覓，他在《實用主義》(Pragmatism.1907)中引述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 1874-1936)的描

述，以說明哲學對個人生活產生的重要意義，

好比一個房客在重視其收入之餘，也要能懂得身為房客之道；即將上戰場的將軍除了知道敵方的人數外，還必須懂得敵人的哲學。我們認為，問題並不是有關宇宙的理論是否影響事物，而是到底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能夠影響事物。(James,1907/1978:9)

詹姆士認為當前哲學關於理性與經驗主義的爭論是不必要的，他認為討論世界是一元還是多元、是宿命的或自由的、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不適用於人類存活的世界中，因為這種爭論是無止盡的，只有皮爾斯的原理，也就是實用主義的原理，才可消融兩者的紛爭。不管信奉的是一元論或是多元論，人們都可以自行選擇信奉的概念與價值觀，但最終都會在實際生活中體現出其效用，這就是知識產生的來源。詹姆士的意思即是，每個人的行為都是帶有個人價值判斷與目的性的選擇，比如信奉洛克的經驗主義者，他或許相信個人可從經驗中學習，所以他獲取智慧的方法主要是依靠感覺官能在經驗中吸收資訊。而他作這件事情的目的，或許是單純求知也或許是為準備考試，無論何者，都可帶給他知識的增長、心靈的啟發。

在《心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中，詹姆士以客觀的生物學基礎解釋人類心靈具有的功能，如注意力、興趣、比較、分類等作用，它們皆是人類心靈本質上即具有的重要利器，普遍性觀念(知識)的產生則是人們用以標誌特殊事物的固定模式，它是有目的作為的一種工具，而非僅只於抽象概念的表達；而感覺、意識與觀念形成的過程則是連續的，藉此否定了感性與理性對立之說法。詹姆士認為對未來目的之追求與用以達到目的方法之選擇，會成為現象界中人類心靈存在(mentality)的標記和標準(Dewey,1984a:15)。這使心靈具有一種創造與預示未來的目的性功用，而心靈所形成的知識若不能跟隨著當前目的而變化，將會落入停滯不前的泥沼；另一方面，詹姆士將生活稱作「純粹經驗」(pure experience)，經驗則為人類心靈的認知作用提供材料(James,1976:4)。他認為純粹經驗若被心靈認識到，便成為認知的對象，同時也連接起認知者與所知對象之間的關係，但純粹經驗本身並無任何先前存在的價值。由此可見，詹姆士認

為對經驗的所作區分乃是一種認知的結果，但心靈與其產生的認知功能也只是一種區分方式，經驗仍可被其他非心靈的方式加以檢視。

二、實用主義思想對杜威的影響

杜威對皮爾斯等實用主義者的說法大加推崇，他相信知識應作為一種能引人類行動的工具，也就是在變動不定的環境和實際行動中，透過思考整理實踐心得並加以檢證，最後形成用以指導個人生活的一套方法。杜威曾經提到皮爾斯的貢獻即是將獲得事物意義的方式呈顯出來(涂紀亮譯，2006)，皮爾斯認為意義即是事物在實際行為中所產生的結果及它存在於其他事物之中後所產生的區隔，這是實用主義者的一般見解。之後杜威等人的「芝加哥學圈」又為意義引入了另一種特性，即意義可指導未來行動的特性，杜威認為唯有在情境仍具有未確定性之時，才形成意義。皮爾斯所提出的意義的觀點是消解傳統哲學爭議的第一步，認為關於真理問題的探討皆只是意義上的探討，最終一切的探討仍必須返回實際行為之中加以檢驗，杜威徵引此種觀點，將意義視作指導未來之用，藉此以豐富經驗的內涵。

杜威特別讚許詹姆士以科學的方法作人類心理知識的探究，詹姆士融合達爾文的學說以解釋人類的心理活動，顯見出科學主義的確可作出人文般的關懷；另一方面，詹姆士的哲學基礎奠定在對人類心靈意識與其認知功能之探索也對杜威其後的哲學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杜威除了接受詹姆士對人類意識的觀點外，卻認為意識是人類整體經驗的一部份，經驗是生活，也是一種動態的歷程，人類的心靈抑或其他行為，都廣納在經驗整體之內，故經驗實具有無數種性質，人類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探究。但所形成的經驗仍必須在與外界持續產生的交互作用中彈性調整或擴大其範圍，心靈等認知功能也會因此而豐富其內涵。

除此之外，杜威更為強調經驗在此種交互作用的歷程之中，其他環境因素加諸的影響，經驗的組成不單只有人類與其心靈功能，還有心靈之所產生的物理、文化、社會、信仰等因素，故杜威關注的經驗焦點比詹姆士更為廣泛，他不只說明經驗為何或何以形成的方式，且更加重視經驗該以何種方式以才能產生性質上

的變化，從而獲得經驗的成長。

小結：再度返回經驗之中的哲學家

哲學發展至近代，跟隨著遐荒地帶之發現與工業上的新發明，也開始發酵變調，代表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便是在此種文化氛圍底下孕育而生。雖然詹姆士本人不談形上學的問題，但杜威認為詹姆士所主張的實用主義者仍具有一種形而上學的含意(Dewey,1984a:13)，也就是假定世界仍在生成之中。基本上，杜威認為實用主義者並不是輕蔑思想，而是賦予思想創造性的功用，思想是工具，匯聚起來能使世界呈現出更為完整的形貌，使存在物更加明朗。

杜威的這種看法，在在顯示出美國文化的特有精神，美國文化雖不似歐洲具有的傳統文化，卻也因此能身輕如燕地步履於陌生的環境中，大膽探索未知的神秘，不拘泥於傳統或依賴偶像，在行動中發展出樸實的實用哲學觀。秉持民主自由、科學實驗的精神，美國哲學家推陳出新，除了實用主義一派、還有新唯心主義、新唯物論等思想的發跡。誠如杜威所言，哲學不僅僅是文化的被動反映，它本身就是文化之中的一個變動。(Dewey,1927/1984c:7)，美國文化與其孕育之思想相互輝映，然而各種學說之為禍為福均無從預定，它只是打開一個新視野。杜威的哲學替人們開啟生活的一個窗口，也讓人們認識到生活經驗中具有工具般的珍貴價值，工具價值並不只是為了獲取最大的外在效益，也是人們智慧不斷成長的動力。杜威認為，世界可被重新創造，在經驗之中人們思考、求知、行動，人才是創造思想的承擔者、行動者和應用者。這種個人行動必須與周圍環境互動，以形成完整的經驗整體。總之，杜威以工具主義開啟了經驗論的新調，在他的思想中工具是人們成長的利器，它必須在經驗中實際檢驗；而各種思想也必須以經驗作為探究的對象，方能真實理解各種珍貴的生活價值，包含美的價值。